

■新作聚焦

葛亮长篇小说《灵隐》：

在“南方图志”里镌刻人间烟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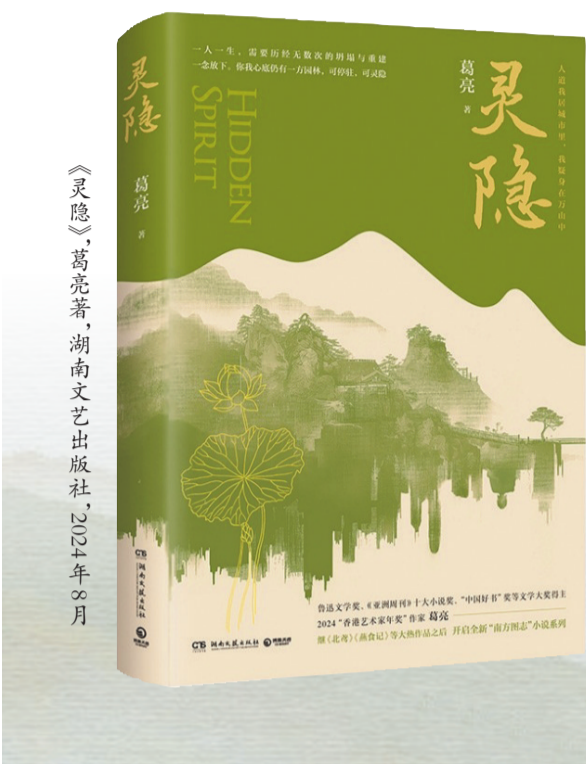
□汤倩

近年来，葛亮的每部作品都在创作旨归和叙事范式上更迭演进、力求突破。此前的“家国三部曲”《朱雀》《北鸢》《燕食记》，皆以呈现历史传奇人物身世及家族薪火存续为线索，以宏阔笔力见证时代风云兴变、聚散流徙，描摹出中国近百年社会变迁、世态人情的雄浑画卷。新作《灵隐》则宕开一笔，以独特的双线叙事结构、深入人物心理动因的追索和丰富的地域文化元素，既接续了《燕食记》以来的岭南文化脉络，又别有一番风貌。正如葛亮自己所言：“《灵隐》这部作品可以说开启了一个新的‘南方图志’写作系列……它更回归和关注于人本身，在人物命运交叠中塑造了一种别样的历史演绎方式。”小说以“父篇：浮图”和“女篇：灵隐”相对应，又缀以“番外：侧拱时期的莲花”，在叙事上形成彼此呼应的美学空间，内容上则以南华大学教授连粤名及其女儿连思睿的命运轨迹为主线，细腻描绘了历史长河中的个人沉浮与社会变迁，为读者呈现了一幅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涌动、变动不居的社会画卷，更以对个人史、微观史的观照切入人间烟火，精致里见出宏大，轻盈中托出浑厚。

扉页题着元代禅师惟则的诗句“人道我居城市里，我疑身在万山中”，颇有全书题眼之意。葛亮并不讳言，《灵隐》的创作灵感与现代人的心境相关。香港在更多人眼里，是一个充满现代性的国际化大都市，但葛亮似乎总是执着于将目光投向中环那鳞次栉比的高楼之外的那座烟火气，从香港现代性的罅隙中去发掘一如古都南京深藏的历史感。比如《灵隐》中写到的太平清醮、猴王诞等古老节庆，还有女篇中一再提到的“香港也有座灵隐寺”。

立足岭南不断北望江南、呈现某种文化对位的写作姿态，其实是葛亮多年来在其香港写作中始终坚持表现的香港这座城市古老与现代兼容并存的特质。葛亮认为，这是香港人对历史抱持的独一份“天然的敏感和尊重”，只要你愿意，永远能在香港那些逼仄的空间里找到压缩得满满当当的历史。看葛亮笔下的故事，总能深深感喟，市井褶皱里的人情世故往往最具打动人心力量。“当人们身处闹市的一方园林时，恍然发现四周全是高楼，会油然而生出一种‘不知今夕何夕’的虚幻与孤独。”而如何守住你心底的那一方园林和净土，在那里游历，在那里呼吸，可能需要历经无数次的坍塌与重建。一念拿起，一念放下，可停驻，亦可灵隐。

小说是以一宗当年震惊港岛的热点事件为切口，通过连粤名和连思睿父女二人互为镜像又彼此缠绕的命运，打开一方人性试炼场，勘察所有入局者多面立体的性格成因与命运走向。在每一次心灵的坍塌与重建中探讨执念与放下、创伤与治愈、和解与告别等话题，也为读者展开一幅从繁华都市到偏远村落落横向绵延、纵向贯穿将近半个世纪的香港社会更迭图景，点染粤港澳乃至闽地百年沧桑变迁史。这正是葛亮一直秉持的微观史观，经由自己的写作指向一个个具体的“个人”来打开时空，在这样博弈和抗衡的演进中呈现更多城市及历史的开放性、包容性和不确定性。正如蔡崇达所言，葛亮借《灵隐》携带的在大时代的破碎感传达出对人性细腻深情和悲悯之心。这既是葛亮虽温润平和却自有撼人心魄的力量之所在，也是他自出道以来便一以贯之的创作根柢。《灵隐》虽不同于前作着力表现时代洪流中的家国兴衰，却以其小而美的微观视角观照个体命运浮沉、拓展香港都市书写，从俗世繁华中照见朴实坚定的温暖力量，以人间烟火知著命运如榘中的历史褶皱，纵有破碎荒芜却始终不失明



月照大江之辽阔，市井巷陌之声与喃喃梵音在字里行间交错流淌，人性与佛性也在气韵流转中浑然交融，有容乃大，气象万千。

葛亮曾说，所谓“灵隐”，是五千年传统中华文化所沉淀下来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那部分，那是“我们中国人缔造心灵的方式”。据此，《灵隐》既是地方史、族群史，亦是心灵史。连粤名由性情温厚、知书达理、处于社会上层的大学教授深陷家庭与伦理漩涡，最后沦落成杀妻犯，而连思睿则经历了爱人变性离世、独子失智、父亲杀害母亲、网络暴力等一系列人生磨难，每一次坍塌都成为她不得不努力重建自我的契机。在连思睿一系列的磨难与重建当中，林昭与段河这两个角色对她的命运轨迹变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不同侧面形成互文。每个人都不得不直面自我最深层的挣扎与痛苦，在命运猛烈的冲击下艰难跋涉，获得成长或者最终放下、自我成全。故事中，除连家父女之外，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袁美珍曾经是一个对爱充满希冀的女子，后来在家庭的经营和女儿的冲突中要强自救，但最终走向精神失常，始终带着原生家庭的伤痛遭遇人世。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条副线。而在段河的家族前史中，金秀与明香一前一后生死相托的故事则和《燕食记》中的月博与荣慧生的故事遥相呼应。弱者罹逢乱世互相扶持并结下深厚情谊，这份韧性和深情正是世纪流转中普通民众之所以绵延不绝的族裔密码，始终是葛亮浓墨重彩书写的中华民族特质。

葛亮以温润如水又有风骨的文字，对笔下每一位个体选择予以尊重，所谓“不假臧否”“对于世界乃至个体的一种微微仰角的态度”，更是叩问心灵之后难能可贵的理解与圆融。这些特质，自葛亮早期的都市异闻录系列，如《浣熊》，到前几年的《飞发》《燕食记》，已有所体现。《灵隐》接续这一悲悯与风骨兼具的情怀，为当代文学界逐渐丰富的

《灵隐》以独特的双线叙事结构、深入人物心理动因的追索和丰富的地域文化元素，既接续了《燕食记》以来的岭南文化脉络，又开启了一个新的“南方图志”写作系列。作品细腻描绘了历史长河中的个人沉浮与社会变迁，为读者呈现了一幅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涌动、变动不居的社会画卷

“新南方写作”带来别样的质感。

葛亮以处于多种文化交汇点的国际大都市香港为锚点，辐射粤港澳及闽南地区，有意识地在城市发展的源流中寻找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交融碰撞的多元面貌。借南方所处空间及语言表达上天然的多变性、开放性和流动性，融入自己对于历史现场和思考与表达。在书写个人史、心灵史、器物史和技艺史的过程中，呈现更丰富多元的现代汉语写作，创作出既有古典质感又兼具现代性冲突的“南方图志”系列。从《燕食记》到《灵隐》，从同庆楼到春秋街，从连胜街到木桥街，从上海、福建到岭南，葛亮在饮食文化和器物技艺的迁徙流变中敏感地捕捉着命运、时代变迁的图景，以日常人间烟火的磨砺和情冷暖打通个人经验与时代历史。作家温柔地摩挲着那些在历史褶皱中依然温润有光的“物”，以人世流转的生命感来构建抵抗文化同质化的文学飞地。

《灵隐》作为葛亮开启“南方图志”系列的一次重要实践，也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他以“物”的重量来沉淀“人”的质感，以尘世老腔通达寺院的梵音，以人间烟火知著百年粤港史，让时代变迁脉络和文化肌理在器物的裂痕与技艺的余温中彰显历史神经元，将岭南文化、客家文化等多元文化因子熔铸于市井巷陌的呼吸之间。人类的历史正是在无数次的自我确认中完成螺旋式演进，葛亮以其“向岭南，向南海，向天涯海角，向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写作，呈现出这种从固定空间到流动载体的转变，勾勒出一幅个体命运与集体记忆交织的图景，恰恰隐喻着岭南文化在现代性冲击下的自我调适，既波澜壮阔又细腻入微，而这正是《灵隐》和葛亮在“新南方写作”中独特的位置所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创作谈

拜访一位岭南画派的画家，谈他的师承，从杨善深谈到高剑父，又追溯到二居。谈当年高师在十香园隐居廉写生，渐说到“外师造化”。黄昏初至，他望一望外头的密密匝匝的楼宇，叹一口气，说如今的城市，哪还有自然造化。

最初写《灵隐》，是因为志莲净苑。身处钻石山闹市，一方幽园，抬头四周鳞次栉比，仿若般若幻境。连粤名的人生，似这幻境，走过的路、看过的人，久之皆着了相。“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链条里藏着宇宙观，说到极，还是人与自然。香港这城，以混杂文化(Hybrid Culture)而著称，古今的、本土的、外来的文化交融混合，身在万山之中，皆是诸法之相。人与自然两极之间，斑驳难辨。写这篇小说，大概寄望于此。“番外”中的阿究，是来自香港新界乡野的自然之子。天生天养，与“黄壳齐眉”这种孕育于大帽山北麓的古稻米，共同重续了这种关联。世俗评估中，阿究的智力是不完全的。“世人皆醉我独醒”，恰恰他的眼睛里看到世界的大部分真相。世人叫他“鬼”，是因为族裔，但他也确实乎是一只“鬼”。他身体黝黑，赤裸奔走于阡陌，如山鬼入林。

“灵隐”这个意象，在小说中重复出现，说到底还是历史观的表达，杭州古刹和香港处于地理边缘的同名寺院形成某种缝合，互文镜像呈现，得以打开平行空间的多重可能，随之破除审美陈见，如《维洛尼卡的双重生命》。“香港也有座灵隐寺”，岭南和江南拉开审美距离，在一个超越时空的对位，所发生种种，呼应连氏父女二人，各在对方的生命历程中看到自己。

小说中有个引渡者的角色——段河。段河出身螺蛳，无牵无挂。原本是澳门博彩场所里的发牌师，跟养父辗转来了香港，做了佛像造像师。连思睿在父亲身陷囹圄后，遭受包括媒体与“网暴”等扑面而来的压力，几乎放弃了牙医工作。段河对她说，你为人拔牙，如同佛为人拔念。马拉德德有个短篇《天使莱文》，其中天使是个穿着旧西装的潦倒黑人，在酒吧出没，如同红尘浪子。世俗的空间和暗淡的场景丝丝入扣，带来的救赎感令人出其不意。段河这个角色是以己身和世俗博弈，因此更多把他放在日常的境遇里勾勒，是一个“将佛像当人像做”、在槛外与槛内出入的形象。引渡者，也承载了连思睿作为一个现代人所面对的生命镜像，给一个困林，可以有所栖居——这就是“人道我居城市里，我疑身在万山中”。

《灵隐》写得不轻松。源于真实案件，需要克制表述事件逻辑的欲望，且在某种程度上，也要控制使作品走向戏剧化的指向，如主人公连教授索妻的具体手段、因由。在写作的过程中，需要将这些东西沉淀，提取相对纯净的、心灵史样态部分。简而言之，放下执着于故事本身的态度，是首要一端。过去的长篇写作，多是在大叙事背景下涉猎群像，而这本书更集中于个体命运的发展。《灵隐》强调个体的意义，从一个人烛照时代，是另一种史观表达面向。主人公人生路途，道阻且长，其有行则将至的信念，首先在身份认同。直把他乡作故乡，靠的是对日常的沉浸。从福建至香港、英国，再回到香港至莆仙原乡。其回归路径的循环，恰由日常中若干细节，织成繁经实纬的人间浮图。建筑井田、一粥一饭、历史衰然，倏忽为背景，人以肉身与时代博弈，精神逐渐强大与独立。越是独立，越是隐而不现，大隐隐于市。

再为语言。主人公生长之处，众声喧哗，广府话、莆仙话、客家话、四邑混杂、中英交互。虽不若巴别塔之艰，但对心理维度的考验，不可谓不大。因其中涉乎信仰，便必关乎砥砺。连教授非长袖善舞之人，学术是他一方堡垒，但并非归宿。在科学与宗教的此消彼长后，他选择了自我放逐。阿嫌留下的那方斗室，他用一只酒瓶装下素馨，以华绣绣藏过去。而就比他的语言只有一种，便是无言。缄口入暗，化归自然。

(作者系广东省作家协会兼职副主席)

文学名刊
近作扫描

《人民文学》《当代》《十月》《北京文学》《中国作家》《青年文学》：

迎着潮水涌来的方向

□吴韩林

本期扫描的诸多刊物中，面对时代奔涌而来的浪潮，作家们以赤诚的笔致与深切的关怀，在呈现个人鲜活经验的同时，也深刻回应着社会的宏大议题。这些作品不仅向着民族的文化记忆敞开，同时又以饱满的现实感，聚焦到当下城乡市民的生活生态。在现实中创作的文学守望者，面对科幻星云或是自然生态沉思与玄想，希冀将人类文明引向遥远而开阔的未来。

踏入“记忆”的河流

文学创作固然离不开虚构，但“记忆”的长河作为丰富且斑驳的存储器，能为作家们的文学创作提供非常丰富的精神滋养。如何激活传统的文化记忆、民族的集体记忆以及个人情感深处的私人印记，是作家们创作时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

在《中国作家》2025年第1期中，王蒙开设“王蒙聊《聊斋》”专栏，通过对《聊斋志异》的文本细读，于嬉笑点评中发幽探微，与蒲松龄进行一场有关文学创作的深层对话。此外，《人民文学》2025年第1期刊发汤唯的中篇小说《江水苍苍》以及叶殊的短篇小说《谁是林黛玉》，分别借用《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以及《红楼梦》“木石前盟”的文学典故，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搭建桥梁，并由此延伸至对生命本真存在的探索与追问。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在这些共享的文化元素中，我们得以识别彼此的身份信息。王

松借长篇小说《橘红》(《中国作家》2025年第1期)复活了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的故事。《北京文学》新年第1期刊发马淑琴的报告文学《魏国元和他的兄弟们》，向抗日战争中英勇斗争的英雄们致以敬意。当我们回首珍贵的过往时，记忆中的那些人与事必定会在时间的淬炼中愈发闪亮。韩东的中篇小说《春梦解析》(《当代》2025年第1期)与邓一光的短篇小说《海水快乐地说》(《十月》2025年第1期)，都在试图唤醒主人公沉睡的记忆。当往事与现实两相对照，有关生活的遗憾与感喟，一一落在字里行间。

在“现实”中写作

敏锐洞察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并以纪实或虚构的方式加以呈现，始终是作家写作的应有之义。《中国作家》2025年第2期“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专栏推出柳岸的长篇小说《天下良田》，记录三代农民在粮田项目建设中的收获与艰辛。魏思孝的短篇小说《大年·初一》(《当代》2025年第1期)则以传统春节为故事背景，在上坟祭祖中让生者与死者重新相逢，以此描绘农村生活的变中之“常”。

在乡村社会的另一端，作为现代文明表征的都市始终散发着吸引力。东来的长篇小说《涉过歧流》(《当代》2025年第1期)、赵瑜的非虚构作品《长城小札》(《人民文学》2025年第2期)以及刘庆邦的短篇小说《京京爷爷》(《北京文学》2025年第2期)，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乡下人进城的社

会流动。虽然进城者年龄上各有差异，但他们无一不是都市的零余者与漫游者。这三篇小说共同提示着我们，因由乡入城的身份转变而导致的交际矛盾，是在不同代际中普遍存在的社会性问题。现代都市生活中既存在周婉京《安徒生的花园》(《青年文学》2025年第1期)所书写的心理难测的现象，也仍然不乏像刘汀《富贵如云》(《北京文学》2025年第1期)中呈现的热忱仗义、富丽堂皇“富哥”形象，正是这种根植于心的“老北京”性格，为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保留着一份难能可贵的温情。

《青年文学》2025年第2期推出全新专栏“玫瑰空间”，聚焦女性生活与都市表达。专栏首期刊发蒋舟舟的短篇小说《故事里总有两个女人》及其与栏目主持顾拜妮的有关问答，挖掘艺术背后深藏的女性叙事。《当代》的“发现”栏目旨在推出文学新人，2025年第1期刊登林楠的短篇小说《徒木史》与《夜巡》两则，同样呈现出青年写作者对于城市生活鲜活而又热烈的别样体认。

作家们在“现实”中写作，也是对当下文化生态的关注。张平《刀郎的歌声，撼动了谁的心弦》(《当代》2025年第1期)聚焦刀郎复出所引发的社会热潮，讨论流行文化的传播与大众接受，挖掘其背后蕴含的社会心理机制，呼吁人民能够广泛参与的时代文化的到来。在如今“逃离北上广”的口号下，“县城”自然而然成为广大青年心中暗想的桃花源地，因而在互联网掀起一股“县城文学”热。为此，《十月》(2025年第1期)首开专栏“县”在出发”，同时推出老藤、马南以

及刘星元等人的作品，力图呈现一种具体而细微的“县”乡经验，寻找一种由地方通达世界的写作样态。

“现实”不应局限于此时此地，域外的大千世界同样值得我们关注。海外华语作家陈河的中篇小说《卢默夫妇》(《北京文学》2025年第1期)讲述着新移民家庭的邻里日常，张翎在《北京文学》的专栏“到世界去”先后刊发两期走进东非的游记散文《徒步的游牧者》(2025年第1期)与《乡村篇》(2025年第2期)。此类跨文化交往的身体经验，共同彰显出一种在“世界”中写作的中国气候。

面向科幻，抑或走进自然

2025年，人工智能大模型DeepSeek的横空出世，成为互联网讨论热度最高的话题之一。面对AI技术的飞速进步，幻想未来的科幻似乎已然成为进行时。今年，《中国作家》与华语科幻星云奖组委会联合设立“科幻星云”专栏，先后推出贾煜的中篇小说《嬗变》(2025年第1期)和星河的短篇小说《非逻辑世界》(2025年第2期)，为读者想象未来世界提供多种可能。

技术的进步固然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便捷，但倘若技术一旦超出人类控制，也必然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李凤群最新长篇小说《将歌唱》(《人民文学》2025年第1期)写的是一个技术失控后的故事。小说体现出科技与人性之间的两难博弈，这种新时代的伦理难题是悬在每个

紧经实纬
的人间浮图

□葛亮

